

杨庆祥:文学是我理解当代中国的中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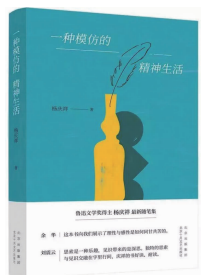
2013年,青年学者杨庆祥一篇《80后,怎么办》在《天涯》杂志发表后,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。作家阎连科读到文章很是惊喜,“终于有一个人把这一代人的问题集中进行了梳理和思考。”诗人北岛看到之后跟杨庆祥说“觉得文章挺重要的”,于是这篇文章再次发表在香港的《今天》上。

文章中,杨庆祥结合自己的个人体验、观察和思考,提出一个判断——“80后是失败的一代”。他以自己博士毕业留校任教却多次辗转“蜗居”的经历,描述自己以及部分同代人无定所的窘境和痛感:“我们的成长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,我们享受了父辈难以企及的物质丰富与个人自由,但我们遭遇了我们的父辈完全陌生的痛苦,那就是飞涨的房价与贫瘠的收入之间的落差。”但是更为关键性的失败并不是物质意义上的,而在于这代人由于“历史存在感的缺席”所表现出的沉默、边缘,从未找到面对社会和历史“发声”的方式。

十年过去,步入不惑之年的杨庆祥,如今已是知名的学者、诗人,去年又获鲁迅文学奖文艺评论理论奖,成为世俗意义上不折不扣的“成功者”。无论外部世界,还是个人内心,都经历了巨大的嬗变。当初的“失败感”还在缠绕着现在的他吗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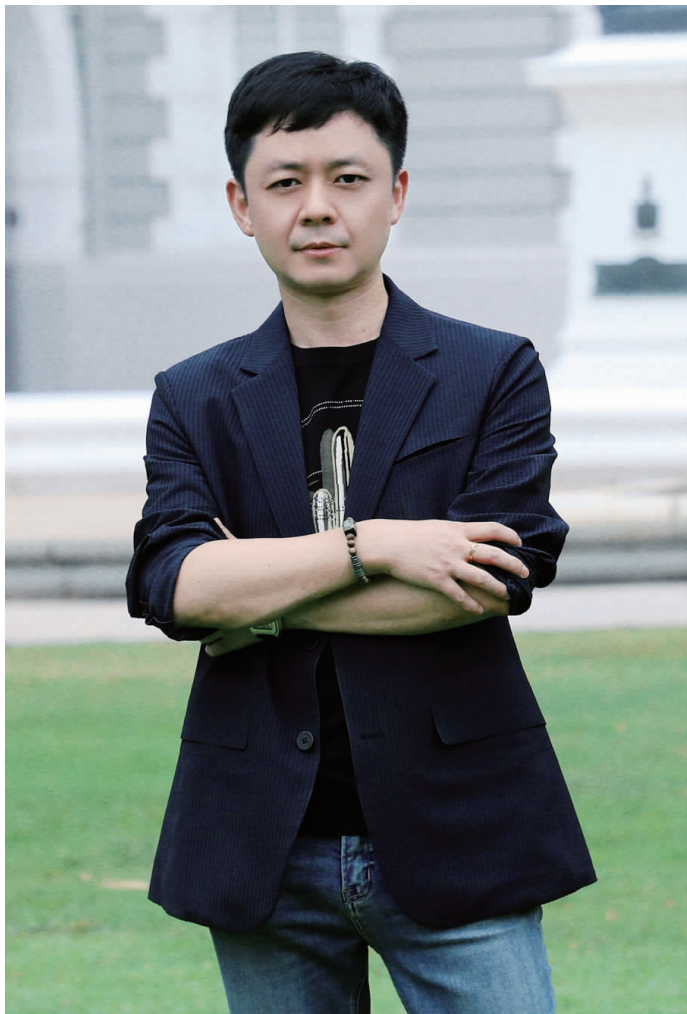
近日出版的随笔集《一种模仿的精神生活》,延续了杨庆祥对于自身和同代人的观察与思考。在书中,他如实记录自己2008-2019年“黄金时代”的生活,写父亲,写毕业找工作,写成家立业,忽然意识到,每个人其实都可以赋予平凡生活那么一丁点光辉。他也借助自己阅读余华、王小波、安妮宝贝的经历,回溯了一代人的精神史。有别于一般学术文章的“客观中允”,其中掺杂着浓烈的主观情愫。书并不厚,每篇文章的篇幅也不长,却始终给人一种沉甸甸的感觉,是他对当下的自我和时代最深入的剖析与交代。

现代快报+记者 陈曦



杨庆祥

1980年生。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,博士生导师。主要作品有批评集《80后,怎么办》《社会问题与文学想象》,诗集《我选择哭泣和爱你》《世界等于零》等,曾获冯牧文学奖、茅盾文学新人奖、鲁迅文学奖等。



学者、批评家杨庆祥 受访者供图

这十年,对很多文学作品的评判发生了改变

读品:能说说这个书名的含义吗?何为“模仿的精神生活”?

杨庆祥:这是我2008年写的一首诗里的一句话,写的是当代年轻人找不到生活实感,难以和世界发生真切血肉联系的一种感受。我们这一代人,就像路内的《雾行者》里所写的,成长于全球化消费主义的环境,经历了中国社会发生的剧变。人口的大规模流动,以及随之而来的身份流转和不确定性,让我们跟土地、家园的关系变得特别疏远,无论精神生活还是物质生活变得有一些虚妄。就像我在书里谈到,当年我看《上海宝贝》,看亨利·米勒,小说里的欲望世界与庸常贫瘠的现实生活形成对比,以至于我试图通过阅读,接近甚至模仿小说里的那个世界。其实这些书里的人跟我生活在不同的语境里面,但我就想去过那样的精神生活。

读品:后来你又读到《心灵史》,称这本书照亮了你的灵魂和精神,将你从《上海宝贝》里的小资产阶级幻梦中惊醒。

杨庆祥:这篇文章是我十年前的感受,现在我并不这么认为。现在我依然认为《上海宝贝》不是一种真实的生活,而是被资本引导的想象中的欲望生活,但是我也不再认为《心灵史》就代表了更真实、高级的精神生活,这也是想象和建构出来的一种生活。如果说,那种沉溺于个人欲望的小资产阶级生活不值得信任的话,那么以贫穷为美的精神生活就值得信任吗?这也要打个问号。我要同时从两种话语里面抽身出来审视它们,找到自己对于世界的理解方式。但问题在于,我们并没有找到。我们还是会依附于既有的一些方式去理解这个世界。

读品:虽然你的想法变了,但书中还是收入了这篇文章。

杨庆祥:我不害怕面对自己的局限性,一个人不可能由始至终活在一种观念里面。我在人民大学讲改革史与文学史的互动,分析比较路遥的《平凡的世界》和余华的《兄弟》。我以前认为,关于社会转型期的书写,《平凡的世界》比《兄弟》更重要,但现在我的看法变了。《平凡的世界》就是个人奋斗的神话,这个神话已经终结了。它让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沿着孙少平和孙少安的路走,我们就能走到一个完美的世界,然后人人得到幸福。这里面有一种“不真实”东西,尤其是站在后设的视野来看。余华的《兄弟》则以一种反讽、撕裂、预言式的方式揭示了这样一个狂欢的历史进程里面个体真实的感受。

以自己为案例,探讨一代人的困境

读品:十年前,也就是2013年,你的一篇《80后,怎么办》引起过广泛的关注和讨论。你结合自己的个人体验提出一个判断,“80后是失败的一代”。为什么这么说?

杨庆祥:我是从个人经验出发了那篇文章。当时北京房价很高,我刚刚博士毕业留校工作,买不起房,居无定所。在一个财富高速增长的时代,作为大学老师的我买不起甚至租不起房,不能回报家庭和社会,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生活,这种“失败”是显而易见的。我是把自己作为案例,探讨一代人在社会转型期遭遇到的困境。但真正的失败还不是物质意义上的,而是指我们这代人没有发展出自己对于所处世界的一种判断,没有发展出解释、言说这种急速变化事实的话语、思想或理论。这才是关键性的失败。

2015年这篇文章扩展成一本

书,引起很大的反响。但那只是我阶段性的思考,其实已经是过去式了。这十年,无论经济、文化,还是世界宏观形势,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,完全不是我在写《80后,怎么办》时所能想象的,比如我们完全不可能预判房地产会发生今天这样的变化。这导致我以前的判断、立场都发生了巨大的位移。现在,不仅是80后思考“怎么办”,每个人都在问“怎么办”。

读品:这十年,80后已经融入生活秩序,已经或正在迈入不惑之年,现在的你应该属于世俗意义上的“成功者”。你的想法有改变吗?

杨庆祥:不能因为我个人的生活安定了,境况改善了,就轻易下定论。如何言说这个时代,我觉得到现在为止还是有非常多的困惑,甚至是缺失。大家为了生活而生活,为了保全目前的生活而生活。据我观察,以前女外卖员很少,现在女外卖员多了很多。

在漫长的历史无聊期,要兴高采烈活出自我

读品:你在人大教书,接触到更年轻的代际,据你观察,90后、00后们还有如你那般要从历史中拯救自我、抵抗失败的宏愿吗?

杨庆祥:我没有做过社会调查,所以没法一言以蔽之。如果从一些文学文本看,我觉得变化还是有的。80后这代人普遍有个人奋斗的愿望,但从我有限读到的90后、00后的文学作品看,感觉他们跟现实的关系更加疏离了,他们更愿意沉浸在个人想象的世界,获得自我满足。以前我们总是渴望跟世界发生剧烈的互动,他们好像没有这种渴望,这是挺有意思的一个变化。这种变化不是负面的,它可能更积极。你跟世界发生剧烈的互动,意味着你可能会被现行秩序俘虏,不由自主地融入其中,从而强化了既有的秩序。他们在自己的世界遨游,可能蕴含着重新解放的希望。

读品:正如你所说,现在每个人都在问怎么办。大家都挺迷茫的。对90后、00后你有什么建议?

杨庆祥:每一代人面临的问题是不一样的。我们这一代面临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就是买房。对90后、00后来说,房子问题不是可以搁置了?但他们要面临的是一个漫长的历史的无聊期,可能会缺少我们这代人曾经有过的兴高采烈、意气风发。所以对他们来说很重要的就是怎么制造生命中的奇迹,在一个很疲乏的历史周期里面,让自己的生命变得有趣、可爱、好玩儿,这特别考验大家的情商智商。作为即将老去的80后,我觉得应该有一些责任感,就是尊重年轻人的创造性活动,不要一副充满爹味地教导,要尊重他们,如果有能力就帮助他们一下,托举他们一下,大家一起兴高采烈地喝点酒,聊点文学艺术生活,一起完成自己的生命,就特别有价值了。

读品:走过了黄金时代,发现我们都是平凡人。你说“唯有如此,我们才能从现代性的惯性里走出来,过上一种平凡、自由而审美的生活”,是什么意思呢?

杨庆祥:我在书里面讲到“平凡”,同时还有两个词,“自由”和“审美”,这三者的前提都是自律或理性,只有在非常自律和理性的前提下思考生活,跟他人发生亲密关

系,建构有效的连接才可能真正获得在场的自由、审美。在这个过程中,平凡其实变成了一种非常稀缺的品质。

在我看来,荣格提出了平凡最本质的定义,平凡即“使意志与能力协调一致”。平凡并非放弃自我,恰恰是自我的觉知是平凡的前提,只有理性地变成了成熟的人,才能够正确地衡量和评估自己的能力。平凡也并非不思进取,而是对志向有准确的定位,不去盲目狂热地追求世俗意义上的“成功学”。更重要的是,将知识和能力转化为一种人生和生活的智慧,内在觉知和外在世界进行良性互动。

关注点不在于作家作品,而是我们时代的困境

读品:2011年左右,你和黄平、金理组团在《南方文坛》就现当代文学的一系列问题展开讨论。2013年,陈思和主编《“80后”批评家文丛》,一批80后青年批评家集体亮相。相比前辈批评家们,你觉得80后批评家有何特点?

杨庆祥:没有特点。还是在干一些重复的活,把50后、60后、70后当年干过的活又重新干一遍,只不过对象不一样了,如此而已。当年大家觉得80后可能有什么不一样,现在发现没什么不一样。王安忆说,我们都是同代人。代际的差异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。所以我现在不再谈代际问题了。这两年,我谈“新南方写作”,谈“新浙派”,谈“新北京作家群”,强调文学的“地方割据”。我不再强调时间,因为时间没有带来改变;我现在强调空间,看看能不能从空间里面找到一些异质性的东西。我一直在寻找新的可能性,我觉得在这一块我还是作了很大贡献的,提出过很多让人讨论的新概念,我当年提“新伤痕”时也引发过热议。我一直寻找的不仅是文学,而是比较大的文化思想的东西,来应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困境。

读品:有哪些当代作家是你比较关注的?

杨庆祥:也没有。这不是我的关注点。我不像一些专家学者那样去研究具体的作家、作品或文学思潮。作家作品只是我表达自己对于世界和当代中国理解的一个“中介”。我有时候会跟朋友交流说,这个小说写得挺好的,但这并不重要。对我来说,它作为一个中介能够带给我触动,引发我的思考,这才是最重要的。一篇小说从艺术角度看,可能不是非常成熟,甚至写得很差,但是它涉及的社会问题碰到我了,我也会把它作为一个材料引用。作家们可能听到这个都不高兴,因为作家对批评家的期待,是跟踪做他们的作家研究,成为“路遥研究专家”“余华研究专家”,他们觉得这样特别好,但这非我所求,也非我所愿。

读品:文学作品只是你批评的介质、材料,对于社会整体性的关注大于您对于具体文学作品的关注,是这样吗?

杨庆祥:对具体的文学作品发表看法,不是我的追求。现在讨论作品也都是夸来夸去,讲讲语言好、人物好,再引用一些历史、哲学的概念,或是把西方理论家的东西拿来生搬硬套,其实意思不大,有的也是名不副实,或者说“两张皮”。